

开创中国特色马克思学

——《马克思学新奠基》评介

刘 军

20 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人们对传统的理解方式和解读模式不断进行反思。就国际学术界而言,“走近马克思”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感召力的口号。直面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从马克思文本著作出发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质成为普遍的学术研究方向。以美国学者洛克莫尔(Tom Rockmore)为代表,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Marx after Marxism)成为国际学术界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就国内学术界而言,“回到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种认识,但由于缺乏切实的学术目标和具体的研究路径,这些研究离真正“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还存在很大距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出版了他的新著《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本书作为综合国际、国内学术界最新研究趋势的新著,其最大价值在于旗帜鲜明地提出“开创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这一宏伟目标。同时,为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具体说来,这种奠基性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五条原因。该书指出,“马克思学”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专利,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在我国已经初步成型,要开创新局面,主要突破口与生长点首先是要加强马克思研究,创立一门“中国马克思学”;二是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基础性、前提性,我们应当提出开创一门马克思学,在研究方式上,应注意对马克思的生平、事迹、著作进行全面研究,加强马克思传记、谱系学、版本学的研究,将之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创新的一块理论奠基石;三是为了借鉴与超越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所谓“三大对立论”,我们需要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四是为了更好地回应“千年马克思”、“最大哲学家”的国际呼唤、时代呼唤,有必要创立“中国马克思学”,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重新奠基;五是创立“中国马克思学”,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开掘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第二,界定了“中国马克思学”的五层涵义。该书首先对当前学术界普遍流传的一个观点,即“马克思学”是法国学者吕贝尔(Rubel)于 1959 年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Estudes de marxologie)丛刊上第一次使用的说法,进行了澄清。在文献考证基础上,作者认为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的梁赞诺夫就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概念。在 1927 年 4 月梁赞诺夫为 MEGA1 撰写的前言中,就出现了几处“Marxforschung”的字样。这个德文词汇的构词形式与法文的“Marxologie”相同。正是由于梁赞诺夫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并使用了“Marxforschung”这样的德文表述,吕贝尔才继而采用“Marxologie”这样相同的法文构词形式。相应地,在英美学界,也使用了相同的构词形式,创造了英文的“马克思学”(Marxology)。该书提出,要借鉴、超越苏联的马克思学研究,以及吕贝尔等人建立的西方马克思学,创建赋于 21 世纪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即系统深入展开对马克思文献、历史、理论的综合研究,使之成为一门严格的历史科学、文献科学与理论科学、哲学科学,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理论创新做出新奠基。作者提出,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包含五层涵义:(1)中国人独立研究,借鉴并超越“西方马克思学”和“苏联马克思学”的成果,在世界范围内成一家之言;(2)超越“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三种流行的解读模式,采取“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直面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3)将中国古典解释学、西方近现代解释学和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熔为一炉,尤其是解释方法上凸现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4)对马克思的解读要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尤其是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提法;(5)开创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要与中国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工程。

第三,提出了创立“中国马克思学”的五大理论目标。“开创中国马克思学”,并非空中楼阁式的口号,而是建基于一系列具体的、可资操作的研究目的。首先,要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要走向新阶段,必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原生形态,即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发展过程、哲学创新的思想主线和哲学创新的精神实质三个问题;其次,要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局面。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改变长期存在的“灯下黑”盲点现象——马克思本人著作与思想远未得到应有重视和深入研究,要系统、周密地加强马克思本人著作和思想的研究;再次,要超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研究。苏联的马克思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形成作为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苏联的马克思研究总体是好的,教条主义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后一阶段,对马克思的研究陷入僵化、简单化和教条化的泥潭。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肃清苏联模式的影响;复次,要超越西方马克思学和新马克思主义“三大对立论”。西方马克思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由于其立场和方法的局限,一些观点尤其是所谓的三大对立论——马克思自我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以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则是需要加以批判超越的;最后,要回应千年马克思,阐明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当代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法国的德里达、德国的哈贝马斯、英国的吉登斯和美国的詹姆逊为代表,一些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先后走近马克思,并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了当代西方主要国家的思想主潮。以此为铺垫和契机,面对新的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危机,马克思研究开始走出低谷。创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就是要应对时代发展的最新要求,为创造新时代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奠定哲学基础。

第四,提出了创立“中国马克思学”的四大理论基石。要突破“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的传统解读模式,实现“以马解马”解读模式的创新,并开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必须建立四块铺路基石:(1)以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为基本原则的新型解释学。马克思哲学解读具有其自身不可否认的客观性,包含马克思其人其思作为社会存在和历史存在的客观性、马克思哲学文本和文本体系的客观性、马克思哲学文本历史背景客观性、马克思哲学文本语言文字、语境语义的客观性、马克思哲学理论内容与发展轨迹的客观性以及马克思哲学文本、哲学范畴内在联系的客观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解读,又有不同层次的主体性,包含解读活动的一般主体性、时代主体性、国情主体性以及个人主体性。因此,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要扬弃和超越主体性和客观性各执一端的片面性,更好地把握二者对立统一的和谐结合;(2)以突出马克思哲学创新十大文本为主旨的新型目录学。作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从恩格斯书目到MEGA2版共10份马克思书目,并进行了比较,并将马克思目录学的发展概括为19世纪—20世纪初“少而不全”的初创阶段、20世纪“多而不精”的阶段、21世纪“重点全面”的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发展三个时期的十大文本;(3)系统回答版本学研究四大课题的新型版本学。建立新型版本学,要依次深化四项研究内容:要从时间、地点等十个方面澄清版本来历;要理清原本、祖本、母本、别本和新本五类版本发展历史;要从版本底本、版本结构、版式设计、文字加工、注释说明以及装帧形式六个层面进行版本比较;要形成版本评价的标准体系,分出臆本、劣本、残本、全本、草本、正本、定本、善本等八个等级的版本;(4)总揽马克思文本四个层次的新型文本学。对马克思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文本,作者认为应该从四个层次去把握:篇——即马克思的单篇文献,是马克思文本体系的细胞,是建构马克思文本学的基础性环节;组——是在同一时期围绕同一个大主题展开的文献集合体,马克思的文本可分为10组论著、7组手稿和30组笔记;系列——指同一类马克思文本构成的集合,马克思文本大体上由四大系列组成,即论文著作、著作手稿、读书笔记和书信;群——每个历史阶段马克思各种文本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50年的创作生涯写出了四大文本群,即青年马克思早期文本群、19世纪40年代哲学创新文本群、五六十年代《资本论》文本群、马克思晚年文本群。

开创中国马克思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理论创新来说,将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基础性工程。不可否认,本书作为开创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铺路之作,在某些方面还需要丰富和完善。众人拾柴火焰高,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们应该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为开创中国特色马克思学贡献一己之力。

(责任编辑 严真)